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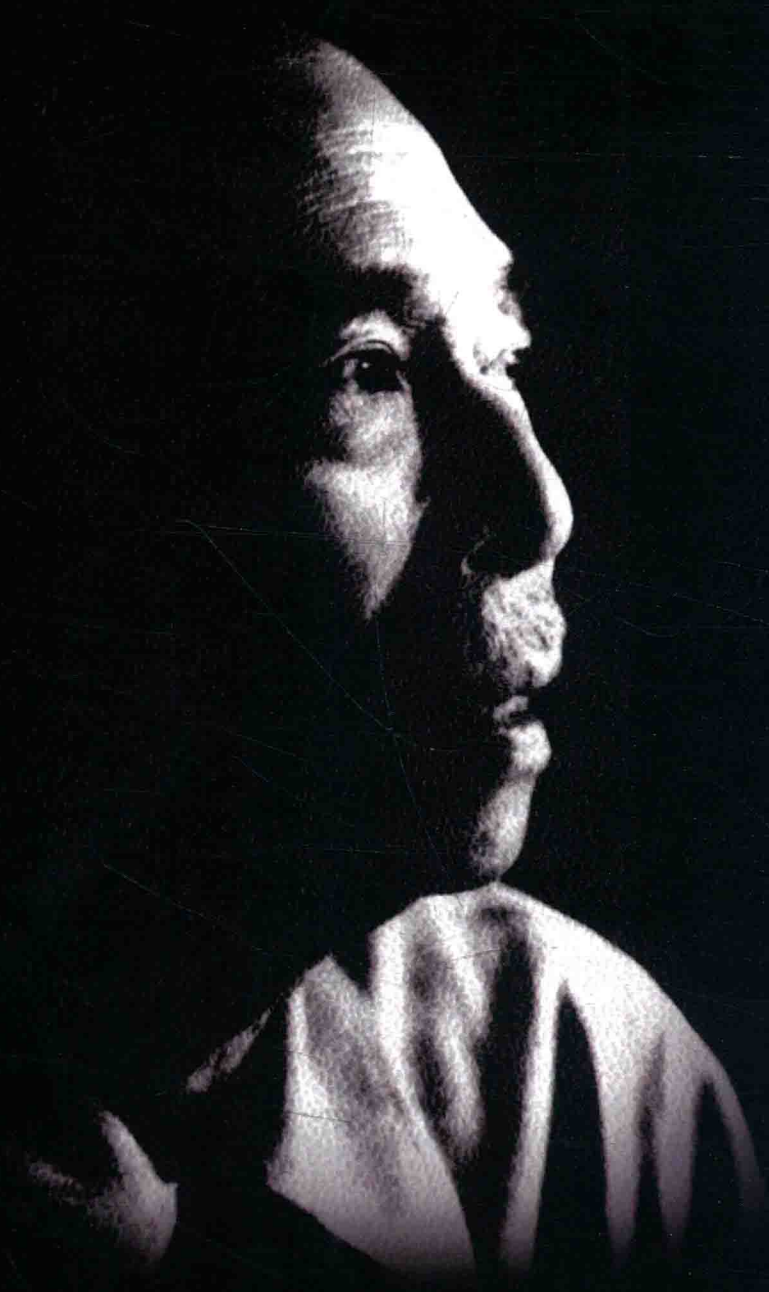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34

茅盾—「人生派」的大師

黃侯興◎著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黃侯興◎著

34

茅盾
——「人生派」的大師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茅盾——「人生派」的大師／黃侯興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226 面；19×26 公分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第 34 冊）

ISBN：978-986-322-724-3（精裝）

1. 沈德鴻 2. 中國當代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908

103010444

中國茅盾研究會《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編委會

主 編：錢振綱 鍾桂松

副主編：許建輝 王中忱 李 玲

特邀顧問：

邵伯周 孫中田 莊鍾慶 丁爾綱 萬樹玉 李 岫

王嘉良 李廣德 翟德耀 李庶長 高利克 唐金海

ISBN-978-986-322-724-3



9 789863 227243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

第三四冊

ISBN：978-986-322-724-3

茅盾——「人生派」的大師

本書據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3 月版重印

作 者 黃侯興

主 編 錢振綱 鍾桂松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7 月

定 價 60 冊（精裝）新台幣 1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茅盾——「人生派」的大師

黃侯興 著

作者簡介

黃侯興，福建泉州人，一九三四年生於印度尼西亞泗水市毛石沙里鎮。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傳媒大學兼職教授。主要學術著作有《郭沫若的文學道路》、《魯迅——「民族魂」的象徵》、《郭沫若——「青春型」的詩人》、《茅盾——「人生派」的大師》、《孔子與〈論語〉》、《中國散文史大綱》等二十餘部。散文作品有《殘破的世界》、《北大九年》。

提 要

茅盾是中國現代文壇「人生派」的大師。此立論成為貫穿全書的主旨。

本書較全面地論述了茅盾自「五·四」以來堅持「為人生」的文學主張及其緊密配合時事政治的文學創作理念。對其長篇小說代表作《子夜》、《腐蝕》所展示的社會背景思想內涵和藝術特色，做了確切的解析；對其散文創作的藝術成就，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本書第六章著意之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茅盾雖然在文化部門擔任要職，卻謹言慎行，採取自我封閉的策略，不斷調整自我對時局的適應度，其文學主張與評論也出現了搖擺反覆，同時披露茅盾晚年頹唐之心緒，反映了老一代智識分子悲劇的命運。



目

次

第一章 跨進人生大門的第一步·····	1
1. 早年生活的文化氛圍和民主意識的覺醒·····	1
2. 「爲人生」的文學主張·····	8
3. 「五四」期的文學評論活動·····	16
4. 文學與政治交錯的現代文人現象·····	34
第二章 大革命失敗後的文學創作·····	43
1. 《蝕》：悲觀幻滅的思想情緒的自白·····	43
2. 《野薔薇》：一幅灰色迷亂的社會生活的圖畫·····	54
3. 《虹》：心火照明的反省·····	60
第三章 「左聯」時期輝煌的文學業績·····	65
1. 《路》《三人行》：表現新的意識形態的嘗試·····	65
2. 左翼文藝的堅定捍衛者·····	72
3. 《子夜》：殖民地化的現代中國都市的縮影·····	86
4. 《林家舖子》《春蠶》：三十年代江南村鎮的破敗 景象·····	111
第四章 抗日戰爭時期的文學活動·····	131
1. 在抗戰烽火中奔走呼號·····	131
2. 《腐蝕》：一部拯救人類靈魂的書·····	144
3. 《霜葉紅似二月花》：蘊蓄「紅樓」神韻的小說·····	151
4. 《清明前後》：話劇創作的得失·····	162
第五章 絢麗多彩的散文世界·····	169
1. 「行文每不忘社會」的議論性散文·····	169
2. 探頤索隱的藝術結晶·····	177
3. 探索心靈的樂章·····	189
第六章 建國後的文化心態與文學活動·····	199
1. 自我封閉與調整適應度·····	199
2. 文藝思想與主張的搖擺反覆·····	209
後 記·····	223

第一章 跨進人生大門的第一步

1. 早年生活的文化氛圍和民主意識的覺醒

一八九六年七月四日（清光緒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茅盾生於浙江省桐鄉縣烏鎮。

傳說春秋時烏鎮是吳疆越界，吳在此駐兵以防越，故名「烏戎」。何以稱「烏」，傳說是越國諸子分封於此，有號「烏余氏」，故稱，後世因襲了這個稱謂。唐朝咸通年間，這裡正式稱為鎮。

六朝以後，以橫貫市區的車溪（俗稱市河）為界，河西為烏鎮，河東為青鎮。雖分為兩鎮，但人們習慣地統稱為烏鎮，青鎮人亦自稱是烏鎮人。茅盾常常懷著深厚的感情思念他的故鄉：

故鄉！這是五六萬人口的鎮，繁華不下於一個中等的縣城；這又是一個「歷史」的鎮，據《鎮志》，則宋朝時「漢奸」秦檜的妻王氏是這鎮的土著，鎮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蕭統偶居讀書的地點，鎮東某處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齋叢書》的鮑廷博的故居。現在，這老鎮頗形衰落了，農村經濟破產的黑影沉重地壓在這個鎮的市廛。〔註1〕

茅盾的父親沈永錫（字伯蕃），清末秀才，年輕時隨岳父——江浙一帶名醫陳我如學習中醫。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他成了維新派人物，贊成君主立憲政治，也贊成「西學為用，中學為體」，曾計劃到杭州進新立的高等學堂，後

〔註1〕《故鄉雜記》，《茅盾文集》第9卷，第12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

或赴日本留學，或去北京進京師大學堂，但都未能如願。他渴求近代西方科學知識，買了一些聲、光、化、電的書，介紹歐美各國政治、經濟的新書，以及介紹歐洲西醫西藥的書。在自然科學中，他對數學格外有興趣，自習代數、幾何、微積分。茅盾五歲發蒙時，父親不同意他進私塾，而要母親在家裡親自教育，教材是《字課圖識》，《正蒙必讀》中的《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以及母親根據《史鑒節要》編寫的淺近文言的歷史讀本。父親臥床三年，立下的遺囑，不是關於產權繼承等問題，而是論述「中國大勢，除非有第二次的變法維新，便要列強瓜分，而兩者都必然要振興實業，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願在國內做亡國奴，有了理工這個本領，國外到處可以謀生」。遺囑還提醒二兒子沈澤民「不要誤解自由、平等的意義」。他在清理書籍時，指定茅盾要讀譚嗣同的《仁學》，稱它是「一大奇書」，「你現在看不懂，將來大概能看懂的」。在病榻上，他「天天議論國家大事，常常講日本怎樣因明治維新而成強國」，還常常勉勵茅盾「大丈夫要以天下為己任」。他逝世時才三十四歲，妻子在遺像兩側恭楷寫了一幅對聯：

幼誦孔孟之言，長學聲光化電，憂國憂家，

斯人斯疾，奈何長才未展，死不瞑目。

良人亦即良師，十年互勉互勵，電碎春紅，

百身莫贖，從今誓守遺言，管教雙雛。〔註2〕

父母親的這些教誨、格言，對於茅盾後來形成的濃厚的參政意識和強烈的社會使命感，不能不說是有著潛在的、深刻的影響。

茅盾的母親陳愛珠，出身於名門世家。她自幼好學，跟著老秀才念了四書五經，以及《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列女傳》、《幼學瓊林》、《楚辭集注》等書，能寫會算。十九歲嫁到沈家，婚後，丈夫規定她讀屬於中國通史簡本的《史鑒節要》，以及描述世界各國史地的《瀛環志略》，還規定她負責孩子的讀書教育，除了教讀《字課圖識》、《天文歌略》、《地理歌略》以外，還常常講《西遊記》一類的故事，所以茅盾稱他母親是他的「第一個啟蒙老師」，她的開明思想對茅盾也有深遠影響。

茅盾出生時，因為是長房長曾孫，遠在廣西梧州稅關任職的曾祖父得知後，來信給他取名德鴻，字雁冰，小名燕昌。茅盾七歲時，父親代替祖

〔註2〕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第27、29、45、51、5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父在家塾執教，他因此也進了家塾。父親病後他又轉到王彥臣辦的私塾。一九零四年，茅盾八歲，進烏鎮辦起的第一所初級小學——立志小學讀書。小學校址在鎮中心原立志書院舊址。「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這副門聯所蘊含的人生哲理，幼年茅盾當然還無法理解，但給他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被編入甲班，課程是國文（《速通虛字法》、《論說入門》）、修身（《論語》）、歷史。國文課每月考試寫一篇文章，題目不外乎是《秦始皇漢武帝合論》一類的史論，學生們似懂非懂，跟著老師的指引在文章中「評古論今」。對付這類史論，茅盾發明了一種篇篇可以套用的公式，他的作文因此在全校出名，常常能得點獎品帶回家。次年，父親病故，母親便把全部心血傾注在兩個兒子身上，管教甚嚴。冬天，茅盾轉入植材高等小學，課程有國文、英文、幾何、代數、物理、化學、音樂、圖畫、體操等八九門。第二年的一次童生會考，作文題目是《試論富國強兵之道》，茅盾把過去父親和母親議論國家大事的那些話湊成四百字，並以父親生前反覆解釋的「大丈夫當以天下爲己任」結尾。文章頗得會考主持人盧鑒泉讚賞，批語是「十二歲小兒，能作此語，莫謂祖國無人也」。母親則笑著說，「你這篇論文是拾人牙慧的。盧表叔自然不知道，給你個好批語，還特地給祖父看。」茅盾那時最喜歡的是繪畫課和音樂課。教繪畫的是一位六十多歲的畫師，他教學生臨摹芥子園畫譜，說「臨完了一部芥子園畫譜，不論是梅蘭竹菊，山水，翎鳥，都有了門徑」。音樂課教唱的那首曲調悲壯的《黃河》，也使茅盾的精神爲之振奮。他在課外時間愛讀小說，「小時看的第一部『閑書』也就是《西遊記》，現在我要是手頭別無他書而只有一部《西遊記》時，看上了還是放不下手的」，其他如《三國演義》、《水滸》、《聊齋誌異》、《儒林外史》，也是他在小學時「愛讀的書」（註3）。

烏鎮每年清明以後在社廟舉辦的「香市」，是茅盾幼年最感興趣的節日。從清明到穀雨這二十天內，到「香市」來的農民既是祈神賜福（蠶花廿四分），也是借佛遊春。臨時的茶棚，戲法場，弄缸弄髻，走繩索，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線戲，髦兒戲，西洋鏡——把社廟前五六十畝地的大廣場擠得滿滿的。還有那百草梨膏糖，花紙，各式玩具，燦若繁星的「燭山」，薰得眼睛流淚的檀香煙，木拜墊上成排的磕頭者。廟裡廟外，人聲、鑼鼓聲，孩子們吹的小喇叭、哨子的聲音，混成一片騷音，三里路外都聽得見。茅盾不

〔註3〕《愛讀的書》，《茅盾文集》第10卷，第143～146頁。

僅在這裡鑒賞了所謂「國技」，還認識了老虎，豹，猴子，穿山甲……。〔註4〕故鄉的「香市」給他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一九零九年夏，茅盾從植材小學畢業，考入湖州市立第三中學二年級。有一次作文，自由命題，茅盾以《志在鴻鵠》為題，寫了一篇模仿《莊子·寓言》的約六百字的文章，大意是鴻鵠高飛，嘲笑在下邊仰臉看它的獵人。因茅盾名德鴻，也可說「借鴻鵠自訴抱負」。老師給了一個批語：「是將來能為文者」〔註5〕。

一九一一年秋，茅盾轉到嘉興省立第二中學三年級讀書。此時嘉興府已經瀰漫著革命的空氣，校長方青箱是革命黨人，許多教師也是革命黨人。這裡發生過「剪辮運動」，所以在師生中頗多光頭。武昌起義的消息，偶然從東門火車站傳來，立刻轟動全校。不久又傳來上海、杭州光復的消息，學校因經費拮据提前放假。茅盾回到家鄉，見到全鎮市民都在議論剪辮子的事，「有人主張先剪一半，有人主張四邊剪去，只留中間一把，依舊打辮子，盤起來藏在帽子裡，更有人主張等過了年看個好日子再剪，然而也有爽爽快變成和尚頭的」〔註6〕。茅盾是屬於「爽快」中的一個。開學後，學校裡幾位老革命黨另有高就，新來的學監對學生實行專制，茅盾等人進行反抗鬥爭，結果遭到開除的處分。

辛亥革命給茅盾留下了什麼印象呢？當他回憶這帶有悲壯劇色彩的一幕時說，「雖然我們那時糊塗得可笑，只知有『革命』二字，連中國革命運動史的最起碼的常識也沒有，我們不知道在這以前，有過那些革命的黨派，有過幾次的壯烈的犧牲，甚至連三民主義這名詞也不知道，然而武昌起義的消息把我們興奮的不得了。我們無條件的擁護革命，毫無猶豫地相信革命一定會馬上成功」〔註7〕。當時這些中學生目擊了滿清政府政治的腐敗和民眾生活的痛苦，所以有著改變現狀的願望，茅盾也模模糊糊地給自己幻想乃至預許了一個廣闊自由的未來。然而，「革命」以後的中國並沒有出現一個「廣闊自由」的天地。茅盾等到了什麼呢？他說，「除了可以不必再拖辮子以及可以不必再在做國文的時候留心著『儀』字應缺末筆，此外實在什麼也沒有，於是乎我

〔註4〕茅盾《香市》，《申報月刊》第2卷第7期（1933年7月15日）。

〔註5〕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第77頁。

〔註6〕茅盾《回憶辛亥》，收《印象·感想·回憶》，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註7〕茅盾《回憶是辛酸的罷，然而只有激起我們的奮發之心！》，1943年10月10日桂林《大公報·文藝》。

之不免於缺望，又是當然的事。」一場革命所得的果實，只是剪掉人們頭上的一根辮子，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覺醒了的青年不免失望。此後，「廟是不曾動過，菩薩卻換過多次」〔註8〕。這場革命本是以推翻帝制、倡導共和為宗旨的，然而革命以後封建政治體制與思想體系並沒有被摧毀。這說明在中國要真正實行共和的體制和培養國民的民主意識，是要經歷幾代人的流血犧牲的，決不是一次暴力革命即可成功。

一九一二年冬，茅盾考入杭州安定中學四年級讀書，於次年夏中學畢業。茅盾後來回憶他的中學生時代，頗有感慨，說那是「灰色的，平凡的生活」，「只把人煨成了恂恂小丈夫的氣度」，在學校裡，「書不讀秦漢以下，駢文是文章之正宗，詩要學建安七子；寫信擬六朝人的小札；舉止要風流瀟灑；氣度要清華疏曠」。他先後換了三所中學，但都同樣地充斥著「畸形閉塞的空氣」，而沒有他所渴望出現的那種使人「興奮和震蕩」的政治風潮。那時也無所謂苦悶，因為苦悶畢竟是思想矛盾的反映，而他和周圍的同學卻「只有渾噩，至多不過時或牢騷」。在辛亥年，讀上海的報紙，有些興奮，並且革去了辮子，但那興奮只是一種情緒，而無明確的意識的內容，所以很快即消失了。茅盾說，中學生時代的陳腐閉塞，「幾乎將我拖進了幾千年的古墳裡去」。他後來曾給年輕人設計了這樣一幅「中學生時代」的藍圖：

呵呵！尚在中學校或將出中學校的年青的朋友呀，不要以為你是一個小小的中學生看著那龐大混雜的社會而自慚形穢，不是這麼的，正因為你是個寒苦的中學生，你的骨頭尚未為富貴祿利所薰軟，你有好身體，你有堅強的意志，你肯幹，你是無敵的，你剛在人世，你有年富力強的二三十年好光陰由你自己支配，你自己將來的一切，社會將來的一切，人類將來的一切，都操在你手裡，都等待你去努力創造呢！〔註9〕

不論這是幻想還是理想，茅盾少年時代都不曾得到，所以他寄希望於後來者能珍愛自己的青春。

茅盾中學畢業後，母親從訂閱的上海《申報》廣告欄上知道北京大學在上海招考預科一年級新生，因盧鑒泉表叔在北京任職，便決定讓他報考北京

〔註8〕《回憶之類》，《茅盾文集》第10卷，第37、38頁。

〔註9〕茅盾《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後》，收《印象·感想·回憶》，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大學。一九一三年夏，茅盾十七歲，考入了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文、法、商三科），住在沙灘的譯學館。陳漢章教授本國歷史，沈尹默教授國文，沈堅士教授文字學。沈尹默教授國文，只指示研究學問的門徑，沒有講義。他教學生讀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韓非子《顯學》，說讀此三篇就可瞭解先秦諸子各家學說的概況及其互相攻訐之大要。沈堅士要求學生讀魏文帝《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以及劉知幾的《史通》，章實齋的《文史通義》。外國文學講授司各特的《艾凡赫》，狄福的《魯賓遜飄流記》，由兩位外籍教師執教。世界史採用邁爾的《世界通史》，由一位英國人講授。茅盾當時最愛聽的是由一位年輕的美籍教師講授的莎士比亞戲曲，講完後，他要求學生作英文的論文，自由選題，允許學生任意發揮。假日，他便在宿舍裡讀二十四史。

三年預科學習生活，在這座古氣沉沉的老大學裡，茅盾是埋頭讀書的。他說：「我還是我，除了多吃些北方的沙土，並沒新得些什麼，於是我也就厭倦了學校生活了。」〔註10〕在預科讀書期間，一九一五年五月，日本脅迫北洋軍閥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在京城盛傳；這年十二月，袁世凱復辟帝制，後因雲南、貴州等省發動護國戰爭，紛紛討袁，一九一六年三月，袁才被迫取消帝制。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並沒有在茅盾心中激起任何浪花，沒有表現出一個文科學生應有的政治敏感性。相反，他倒是有興趣去觀賞焰火——那是準備在袁世凱登基時用以慶祝的廣東焰火，帝制取消後，就在社稷壇放掉了。「我和許多同學在這夜都翻過宿舍的矮圍牆去看放焰火，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這樣在半空中以火花組成文字的廣東焰火。那夜看到的火花組成的文字是『天下太平』。據說，本來還有個大袁字，臨時取消了」〔註11〕。

預科三年期滿後，因家庭經濟日窘，茅盾無法繼續讀書，經一位親戚介紹，一九一六年八月，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那時茅盾的母親不贊成他在官場和銀行界謀差。他先是在編譯所英文部設立的「英文函授學校」修改學生們寄來的課卷，一個月後，他被調到中文部同孫毓修合作譯書。下半年，譯著《衣·食·住》（卡本脫著）出版。〔註12〕那時茅盾的月薪三十元，他不計較，只想利用涵芬樓豐富的藏書，多讀書多研究學問。後來茅盾又編

〔註10〕茅盾《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後》。

〔註11〕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第99頁。

〔註12〕據魏紹昌等說，此書初版於1918年4月，屬「新知識叢書」，署沈德鴻編纂，孫毓修作序，原作者譯名「謙本圖」。

纂了《中國寓言初編》，於一九一七年十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年夏秋之交，茅盾的工作有些變動，他要協助《學生雜誌》的主編朱元善審閱稿件。在主編請求下，他翻譯了一篇題為《三百年後孵化之卵》，〔註13〕這是他見諸報刊的第一篇譯作。那時在《新青年》影響下，《學生雜誌》也打算小試改革，茅盾便開始寫些帶有社會政治評論性質的論文，第一篇是《學生與社會》〔註14〕，它的要害是抨擊幾千年來因襲的奴隸道德與奴隸文章。「若夫倡一家言，於學問作科學的研究者，未見其人。豈天之不生才耶？蓋亦世風有以囿之桎之，而士亦無自主心之所致也」。作者提出，「學生在社會中也，力求自主」。這篇論文，對於傳統道德文化的批評，雖嫌膚淺，卻是適應了當時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的思潮的需要，對當時的中學生起到了思想啓蒙的作用；同時它也表現了茅盾對於涉足政治的熱情和社會批評的能力。

真正議論時政並較有深度的是《一九一八年之學生》〔註15〕一文。文章結合世界第一次大戰分析中國如何「免於亡國之慘」時，呼籲學生「翻然覺悟，革心洗腸，投袂以起」，並提出了以「革新思想」、「創造文明」和「奮鬥主義」，作為學生前進目標的三項原則。茅盾要求學生擔負起改造中國的重任，學會在新世紀潮流中奮進而自立於世界。「二十世紀之國家，而猶陳舊腐敗，為文明潮流之障礙，必不能立於世界。二十世紀之人民，而猶抱殘守缺，不謀急進，是甘於劣敗而虛負此生也」。此外，《履人傳》、《縫工傳》，也都是宣揚大丈夫貴自立的思想。在《履人傳》中，他說：「夫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王侯將相無種，丈夫貴能自立，閥閱豈能限人哉。」他那時鼓吹的新思想是人我的解放——人性的覺悟和人格的獨立，雖然還沒有達到陳獨秀、魯迅、李大釗等人那樣激進與深刻，但這種追求獨立與自由的民主意識，成為他後來從政的必要的思想基礎。

一九一八年，茅盾署「沈雁冰」與他的弟弟沈澤民合譯科學普及讀物《兩月中之建築譚》、《理工學生在校記》，以及自譯《二十世紀後之南極》等。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間，茅盾還編寫了《大槐國》、《負骨抱恩》、《千匹絹》、《獅驃訪豬》、《平和會議》、《尋快樂》、《蛙公主》、《兔娶婦》、《怪花園》、《書呆子》、《牧羊郎官》、《一段麻》、《海斯交運》、《金龜》、《飛行鞋》等。

〔註13〕載《學生雜誌》第4卷第1、2、4號（1917年1月至4月）。

〔註14〕載《學生雜誌》第4卷第12號（1917年12月5日）。

〔註15〕載《學生雜誌》第5卷第1號（1918年1月5日）。

「五四」運動的重要意義是解放思想，是中國人民從傳統的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茅盾那時的思想也得到了解放，他拋棄了從前的「書不讀秦漢以下，文章以駢體爲正宗」的信仰，「把從前讀過的經、史、子、集統統置之高閣，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瀏覽歐洲十九世紀各派的文藝思潮，並努力翻譯、介紹，確實受了『五四』時期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的影響。……只有這樣自己探討出來的正確東西，自己才真正受用。當然，因此也走了彎路，付出了十分辛勤的腦力勞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是不得不然的」〔註 16〕。茅盾的譯介外國文學作品和文學評論等工作，是與「五四」同步的。

茅盾從一九一九年起注意介紹俄國文學，搜求這方面的書。他說「這也是讀了《新青年》給我的啓示」。載於《學生雜誌》一九一九年第六卷第四～六期的《托爾斯泰與今日之俄羅斯》，就是他「關心俄國文學之後寫的一篇評論文章」〔註 17〕。他在文章中說，「俄人思想一躍而出……二十世紀後半期之局面，決將受其影響，聽其支配。今俄之 Bolshevism（布爾什維主義——引者），已彌漫於東歐，且將及於西歐，世界潮流，澎湃動蕩，正不知其伊何底也。而托爾斯泰實其最初之動力」。茅盾譯介了契訶夫的《在家裡》、《賣誹謗者》等十多篇短篇小說和劇本，此外還發表了《文學家的托爾斯泰》、《俄國近代文學雜譚》等文。茅盾對於俄國文學的關注和對於俄國革命的「動力」、「遠因」的探究，反映了「五四」前後我國知識界的重要的思想傾向。魯迅說他那時的思想也是注重譯介「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爲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註 18〕。所不同的是，茅盾後來更注重於介紹俄國革命的現狀與國際共產主義的社會思潮，更具有明確的政治功利主義的目的性。

2. 「爲人生」的文學主張

傳播西方文學思潮和譯介西方文學作品，這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艱巨工

〔註 16〕《在「五四」時期老同志座談會上的發言》，《茅盾全集》第 17 卷，第 622、623 頁。

〔註 17〕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第 131 頁。

〔註 18〕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程，從清末（即十九世紀末葉至本世紀初葉）便逐漸開始了，但那時還處在不自覺的、散漫的階段，「其中有價值的自然不少，沒價值的卻也居半」〔註19〕；而且它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仍舊是以傳統的思想文化爲衣鉢的。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豎起科學與民主這兩大旗幟以後，翻譯介紹西方科學文化的工作，才得到應有的重視。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等一批參與「五四」文學革命的文學家，也都把翻譯和研究西方文學思潮及其作品，作爲建設新文學的頭等重要的工作。

應該承認，我國傳統的文藝理論和舊派的文學創作，已經落後於西方文藝迅速發展的潮流，因此急迫的任務就是要學習外國成功的、新鮮的藝術經驗。如魯迅所說，「一切事物，雖說以獨創爲貴，但中國既然是在世界上的一國，則受點別國的影響，即自然難免，似乎倒也無須如此嬌嫩，因而臉紅。單就文藝而言，我們實在知道的太少，吸收得太少。」〔註20〕周作人也強調「須得擺脫歷史的因襲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別人。隨後自能從模仿中蛻化出獨創的文學來，日本就是個榜樣」；結論是「目下切要辦法，也便是提倡翻譯及研究外國著作」〔註21〕。

茅盾擔任《小說月報》的「小說新潮」欄的編輯以後，就鼓吹「要使東西洋文學舉行個結婚禮，產出一種東洋的新文藝來」〔註22〕。他認爲中國文學家有傳播新思潮的責任，「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在將西洋的東西一毫不變的介紹過來；而在介紹之前，自己先得研究他們的思想史，他們的文藝史，也要研究到社會學人生哲學，更欲曉得各大名家的身世和主義」〔註23〕。

茅盾革新《小說月報》，是「將於譯述西洋名家小說而外，兼介紹世界文學界潮流之趨向，討論中國文學革進之方法」作爲宗旨的。他指出：「同人以爲研究文學哲理介紹文學流派雖爲刻不容緩之事，而遙譯西歐名著使讀者得

〔註19〕茅盾《「小說新潮」欄宣言》，《小說月報》第11卷第1號（1920年1月2五日）。

〔註20〕魯迅《集外集·〈奔流〉編校後記》。

〔註21〕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新青年》5卷1號（1918年7月15日）。

〔註22〕茅盾《「小說新潮」欄預告》，《小說月報》第14卷第12號（1919年12月25日）。

〔註23〕茅盾《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東方雜誌》第17卷第1號（1920年1月10日）。

見某派面目之一斑，不起空中樓閣之憾，尤為重要。」〔註24〕

當茅盾熱心於介紹十九世紀歐洲各派文藝思潮與文學作品，並對十九世紀以前的歐洲文學作一番系統研究的時候，他的本意是在做「窮本溯源」的工作，即「取精用宏」，「吸取他人的精萃化為自己的血肉」，借鑒西洋文學來「創造劃時代的新文學」〔註25〕。這種劃時代的新文學，應是能擠進世界先進文學之林，能「分擔世界作家對於人類前途所負的責任」，能「在非常紛擾的人生中搜尋永久的人性」〔註26〕的文學。他對於當時從事文學翻譯的指導思想，提出了明確的意見：介紹西洋文學的目的，「一半固是欲介紹他們的文學藝術來，一半也為的是介紹世界的現代思想——而且這應是更注意些的目的。」〔註27〕茅盾不同於郭沫若，他注重譯介那些呼吸著現代人的空氣，傳達現代人的思想、文化、道德、倫理的信息，具有現代價值的文學作品。追求文學的現代化，反映了茅盾對現實人生的積極態度，也是他從事翻譯與文學批評所堅持的一項原則。

在茅盾看來，具備現代價值的，反映現代人意識的，首推俄國近代文學了，它「描摹人生的愛和憐」，從此發生「改良生活的願望」，「所以俄國近代文學都是有社會思想和社會革命觀念」的。他認為俄國人很重視文學自身的價值，他們視文學為「民族的『秦鏡』，人生的『禹鼎』」，「不但要表現人生，而且要有用於人生」，他甚至斷言，「俄國文豪負有盛名者，一定同時也是個大思想家」〔註28〕。這就是不懂俄文的茅盾何以貼近俄國文學的原因。

茅盾雖然沒有出國留學，但從希臘神話、北歐神話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學研究，騎士文學研究，文藝復興時期文藝研究，橫貫十九世紀，直到「世紀末」文學的研究，如此系統的西方文學知識的積累，加之原有的堅實的國學修養，為茅盾日後的文學活動開闢了一個廣闊的天地。

茅盾發表的第一篇文學論文是《現代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註29〕。它的意義，不僅在於審視與批評了充斥近代中國文壇的偵探小說、黑幕小說、

〔註24〕《〈小說月報〉改革宣言》，《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年1月10日）。

〔註25〕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第134頁。

〔註26〕茅盾《一年來的感想與明年的計劃》。

〔註27〕茅盾《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

〔註28〕《俄國近代文學雜譚》，《小說月報》第11卷第1、2號（1920年1月15日、2月25日）。

〔註29〕載《東方雜誌》第17卷第1號（1920年1月10日），署名佩書。

哀情小說的弊害；更主要的是提出了建設中國新文學的方向。茅盾認為，「文學是為表現人生而作的。文學家所欲表現的人生，決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會一民族的人生」。他提出現代文學家的使命，「是欲把德謨克拉西（民主——引者）充滿在文學界，使文學成為社會化，掃除貴族文學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學的精神」。它「是為人類呼籲的，不是供貴族階級賞玩的；是『血』和『淚』寫成的，不是『濃情』和『艷意』做成的；是人類中少不得的文章，不是茶餘酒後消遣的東西」。顯然，「文學的社會化」、「為人生而藝術」這些命題，是受《新青年》同人的文學主張的影響的，它成了茅盾跨進文學界以後在理論批評與文學創作上遵循的原則。

在《新舊文學平議之評議》、《為新文學研究者進一解》、《文學上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文學和人的關係及中國古來對於文學者身份的誤認》等文中，茅盾對為人生的文學主張作了更具體、更深入的闡釋。

首先，茅盾把新文學解釋為「進化的文學」，它具有三個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質；二是有表現人生、指導人生的能力；三是為平民的非為一般特殊階級的人的。」因此這類作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有人道主義的精神，光明活潑的氣象」〔註30〕。

其次，既然是「為人生」，就要擺正文學和作家之間的關係。為人生的文學，不再是作家個人的、主觀的東西，不是作家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工具。作家「不能隨自己喜悅來支配文學」。「自然，文學作品中的人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但這些思想和情感一定確是屬於民眾的，屬於全人類的，而不是作者個人的」。這種文學，茅盾稱之為「人的文學——真的文學」〔註31〕。這說明「五四」青年覺醒後，追求人我的解放，人格的獨立與尊嚴，已經成為思想文化領域裡的重要課題。中國從封建意識形態和僵化封閉的思想禁錮中走出來，首先要求的是恢復人的價值，恢復自我的存在。茅盾後來在回顧「五四」新文學呈現的斑斕色彩時也說：

人的發見，即發展個性，即個人主義，成為「五四」期新文學運動的主要目標，當時的文藝批評和創作都是有意識的或下意識的向著這個目標。〔註32〕

〔註30〕《新舊文學平議之評議》，《小說月報》第11卷第1號（1920年1月25日）。

〔註31〕《文學和人的關係及中國古來對於文學者身份的誤認》，《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年1月10日）。

〔註32〕《關於「創作」》，《北斗》創刊號（1931年9月20日）。